

古代汉文史籍中的吐蕃赞普名号考

旺多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古代汉文史籍与金石铭刻、敦煌文书、藏文古籍一样,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古代历史、远古宗教、民族关系等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准确掌握汉藏史籍中吐蕃历代赞普的名号及其由来,在藏族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史科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历代赞普名号的由来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考证,同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汉藏史籍 吐蕃赞普 名号考证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9)04-066-05

在浩繁的藏汉古代史籍中,记录最多的是西藏的远古历史和文明。其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吐蕃时期的历史。不管是神话传说,还是正统历史。当然比较确切的文字记载开始于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从此,大量的藏汉史籍中出现了吐蕃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吐蕃赞普当然地首当其冲。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矗立的石碑上、写进了珍贵的文书里、出现在人们的祷告中。他们的名字附上了神圣的色彩、灌进了神秘的力量、展现了时代的特征,成为权力、力量、神圣、纯洁、坚固、宝贵的象征。

从松赞干布到达磨赞普二百年的吐蕃王朝,是西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二百年的时间里,共出现了九位吐蕃赞普。他们的功绩既代表了吐蕃的强盛,又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为整个中国的统一、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章考证的是汉文史籍中松赞干布到达磨赞普九位吐蕃赞普的名号。

一、汉文史料中记载的吐蕃赞普名号

我们研究吐蕃时期的历史、宗教、文化,除了必须接触敦煌文书、金石铭刻等重要史料外,还需要运用大量珍贵的古代汉文史籍。其中《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通典》为必用珍贵史书。

(一) 上述史料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的名号有:

1. 松赞干布:松赞干布、弃苏农、弃苏农赞、器宗弄赞、弃宗弄赞、器宋弄赞。2. 芒松芒赞:《通典》中乞黎跋布。3. 墀都松:《通典》中乞梨弩悉笼,在《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中器弩悉弄。4. 赤德祖赞:乞隶缩(跼)赞。5. 赤松德赞:乞梨悉笼纳赞、乞黎苏笼猎赞、乞黎苏笼腊赞、娑悉笼腊赞、娑悉笼猎赞、乞立赞。6. 牟尼赞普:足之煎。7. 赤德松赞。8. 赤祖德赞:《册府元龟》中作:可黎可(足)祖,长庆会盟碑或甥舅会盟碑中作:彝泰赞普。(九) 朗达玛:达磨。^[1]

(二) 上述吐蕃赞普的藏汉对应名号:

1. srong btsn sgm po^[2]松赞干布、弃苏农、弃苏农

收稿日期 2009-05-24

作者简介:旺多(1963-)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四川大学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藏族历史文化。

赞、器宗弄赞、弃宗弄赞、器宋弄赞

2.mng srong mng btsn 芒松芒赞、乞黎跋布

3.khri vdus srong mng po rje 墀都松、乞梨弩悉笼、器弩悉弄

4.khri lde gtshug btsn 赤(墀)德祖赞、弃隶缩(蹶)赞

5.khri srong lde btsn 赤松德赞、乞梨悉笼纳赞、乞黎苏笼猎赞、乞黎苏笼腊赞、娑悉笼腊赞、娑悉笼猎赞、乞立赞

6.mu ne btsn po 牟尼赞普、足之煎

7.khri lde srong btsn 赤德松赞

8.khri gtsug lde btsn 赤祖德赞、热巴巾、可黎可足、彝泰赞普

9.glng dra ma 朗达玛、达磨

聂赤赞普是公认的吐蕃第一代祖王,从此吐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赞普”称号,分为“赞普”、“赞姆”之别。“赞姆”顾名思义特指“王妃”,而“赞普”之意为“力量”、“神化”、“雄强”、“天神之子”,专指吐蕃赞普。聂赤赞普另有“鵠提悉补野”^[3]称号见于甥舅会盟碑,特指吐蕃赞普家族,应该是赞普的姓氏。是藏文 vo de spu rgyi 的音译。

二、汉文史书中的赞普名号由来

姓名是个人的标志或符号,伴随着人的一生,各民族都特别讲究自己的姓名。藏族获取个人姓名的各种仪式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天文星算与请求活佛高僧赐赠。这种做法带有比较明显的远古文化烙印,可以说是远古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研究藏族姓氏文化的活标本。同样在古代藏文史书中记载,吐蕃赞普的名号与苯教巫师有密切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3-4世纪,聂赤赞普建立雅隆(悉补野部,博)部落后引进苯教。同时修建了雅隆地区第一座苯教寺院——雍仲拉孜寺。这是悉补野部接受苯教的一个标志。从此每个赞普都请有两位苯教古辛(相当于巫师)辅政,直至松赞干布。苯教的势力开始从它的中心——象雄扩展到雅隆地区,开始介入吐蕃的政治,左右王权,成为赞普的军政“顾问”,参与、监督和决策吐蕃重大国政。当他的决策得不到落实遇到障碍的时候,不管是谁,他坚决予以铲除,包括吐蕃赞普。据史书记载,“聂赤赞普被苯波阿龙所杀。”^[4]说明苯教的势力已经居于王权

之上。这种苯教势力无限扩大的趋势,到了止贡赞普的时候受到挑战,他决心剪除苯教势力,制止苯教势力的发展。他将把腹心地带的苯教徒驱送到吐蕃边缘地区,使苯教在吐蕃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由于政权和民众的需要,止贡赞普引进外道或其他苯教,设法与吐蕃固有的原始苯教融合,但是止贡赞普终将不能根除原有苯教势力,他被苯教势力的代表洛昂所杀,他的两个儿子被迫跑到工域和波域地区,王权被洛昂夺取十几年。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苯教势力已完全具备抗衡王权的力量和能力。也说明了王权如果失去了苯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生存能力和把握政权命运的方向。所以布岱杰时期吸取父王的教训,苯教再度兴起,直到赤松德赞时期。苯教再度兴起在客观上给吐蕃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权的稳定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较大发展。

(一)“墀”、“德”、“年”、“赞”的来历及翻译

赞普登位之前或之后的名号直接与苯教巫师有关,可以认为赞普的名号与原始苯教或象雄文明有密切的关系,从赞普的名号可以窥见苯教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那么,为什么在赞普的名号中常带有“墀”、“德”、“年”、“赞”等。

1、“墀”(khri)——从藏文的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宝座”、“众多”、“万”等。但是研究古代象雄文字的一些学者认为“墀”即是象雄语中的“天神”。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远古时期,人们一直确信吐蕃赞普就是“天神”,而且在众多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引述古代传说认为“神自天降,于降神广阔天庭之上,住有雅布拉拉底楚,其子中除三兄三弟外,尚有赤顿次(khri bdun tshigs)共为七子。赤顿次之子即赤·聂赤赞普,来做雅隆隘地之王,降临雅隆地方……”。^[5]唐蕃会盟碑中记载:“神圣赞普鵠提悉补野,自有国极大地浑成以来……以天神下凡,来作人间之王”。第穆摩崖石刻载:“初,恰神天父六君之子,聂赤赞普降临神山降多,做人间之王以来……”谐拉康石碑载:“降临大地作为人之怙主后,又返回天国……”等等。

2、“德”(ldevm ldevu)——意为“智慧”或“谜语”,是指赞普具有的超人的智慧和聪明。

3、“年”、“赞”(gngn dng btsn)——苯教认为地上需供奉的某种神灵。总之“墀”、“德”、“年”、“赞”对赞普赋予某种神圣、某种力量、某种神秘,而且“墀”

往往加在赞普登位之后的姓名之前,而在位时间短暂者无缘获得“墀”号。如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在登位之前叫“松赞”,而登位之后叫“墀松赞”。松赞之子贡日贡赞和后来的牟尼赞普没有获得“墀”号。

“墀”、“德”、“年”、“赞”,这些关键的词语翻译成汉文,自然要遵循音译为主的原则,但也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译法,因此造成了汉藏文名号的较大差距。可一旦掌握了当时的翻译技巧与规律,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现存的古代汉文史书中“墀”、“德”、“年”、“赞”有不同的译法,可谓五花八门。“墀”常见的译法有“赤、墀、器、弃、乞”,另外根据当时藏文的读音(kha ri)又出现了“可黎、乞黎、乞梨、乞隶、乞立”等。“德”(Ide)也是根据当时藏文的读音,省略下加字da而直接读作le。因此在汉文中出现了同音的“隶、纳、腊、猎”。而“年”和“赞”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管汉文如何变化,最初的来源还是藏文。

(二) 根据藏汉语的变化以及翻译的规律来解读和确定吐蕃赞普的名号。

1、松赞干布(617—650年)。在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松赞干布被称作(khri srong btsn)。根据“墀松赞”一词,在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弃苏农、弃苏农赞、器宗弄赞、弃宗弄赞、器宋弄赞”。其中“弃”“器”显而易见对译的是“khri”,“苏农、宗弄、宋弄”是“srong”,“赞”当然是“btsn”。所以汉文名号的最初来源应该是敦煌藏文文书,而不是常见的松赞干布。

2、芒松芒赞(650—676年)在《通典》中译作“乞黎跋布”。这个译法与藏语相距甚远,从发音和当时的译法去理解像是藏文的“khri bal po”。根据现有的史料,芒松芒赞根本没有“khri bal po”的名号。但是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P.T.1288中有一段记载:“于邦拉让,赞普兄乞黎拔布自王位被迫引退。”^[9]这是公元705年吐蕃名妃没庐氏·赤玛类时期的记载。这里的“lha bal po”(乞黎拔布),不管是地名或人名,与汉文中的“乞黎跋布”相近。但这里的“乞黎跋布”肯定不是指芒松芒赞,因为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可是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思考和推测:一是不管怎样,“乞黎跋布”在吐蕃历史上出现过,但是汉文史书中的“乞黎跋布”特指芒松芒赞是否有误;二是在汉文史书中“乞黎跋布”就是芒松芒赞已成定制。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P.T.1288

记载:“及至狗年厯赞普祖墀松赞遗骸于琼瓦灵堂,长期匿丧不报。孙墀芒伦芒赞驻于美尔盖。”^[7]《旧唐书》记载:“弄赞子早死,其孙继立,复号赞普,时年幼,国事皆委禄东赞。”^[8]对照藏汉史料,松赞干布生前确曾传位其子贡松贡赞,但贡松在位五年即薨,松赞干布复位,至公元650年薨时,再传位于其孙芒伦芒赞。芒伦芒赞幼年继位,吐蕃大相禄东赞辅政。因此本人推测“乞黎跋布”可能是藏文“khri dbon po(孙子)”的音译。但是这种推测只是推测,因为史书中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3、墀都松(khri vdus srong)(676—704年)见于敦煌藏文文书,而汉文《通典》中记“乞梨弩悉笼”,《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中“器弩悉弄”。这里的“乞梨”、“器”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藏文(khri)的对音。“弩”就是(vdus),而“悉笼”、“悉弄”就是(srong)。显然“乞梨弩悉笼”、“器弩悉弄”就是藏文“赤都松”的音译。墀都松自幼胆识过人、勇猛顽强,亲自带兵东征西讨,既降伏了南昭的白蛮、黑蛮,又于公元699年成功地铲除了噶氏家族的势力,真正掌握了吐蕃政权。

4、墀德祖赞(704—755年)。此赞普的名号在藏文中有野祖茹、赤德祖赞、赤德祖丹、梅阿充等。野祖茹是赞普幼年的名号,见于敦煌文书。墀德祖赞就是本名“德祖赞”的之前冠上登位后的名号“墀”而得,而“梅阿充”就是“赞普满脸胡须、未老先衰而得名”^[9]。墀德祖赞自襁褓中立位,祖母赤玛类摄政,先后娶唐金城公主、那囊妃芒末杰、南昭妃尺尊。墀德祖赞时期有两件历史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祖母赤玛类摄政后,以唐蕃之间互派友好使者为契机,吐蕃赞普迎娶金城公主,大力恢复和加强唐蕃间的甥舅友好关系,结束了自松赞干布薨逝以来连年的唐蕃战争;二是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而佛教真正进入吐蕃精神领域应该始于墀德祖赞。金城公主时期是唐朝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唐皇武则天大力昌佛,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禅宗。笃信佛教的金城公主进藏定会带动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同时吐蕃也接纳了从西域逃出的佛教僧人。而且在吐蕃王室围绕佛教进行了白热化的斗争中,赞普决心派遣使者迎请印度高僧,修建了供奉五部经典的五座庙殿。应该说赤松德赞时期大力宏佛归功于父王墀德祖赞,但是其结果是给赞普带来了杀身之祸。

此赞普的名号在汉文史书中除了常见的野祖茹、赤德祖赞、赤德祖丹、梅阿充外,还有《册府元龟》、《旧唐书》中的弃隶缩(踊)赞。“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踊赞为赞普,时年七岁”^[10]。“弃隶缩(踊)赞”确定是藏文“赤德祖赞”的音译。即,弃(khri)隶(lde)缩(踊)(gtsug)赞(btsn)。

5、赤(墀)松德赞(742年—797年)。至公元755年父王赤德祖赞被判臣谋害,赤松德赞在纷乱中继位,时年13岁,备受反佛贵族的掣肘,直到彻底清除反佛势力并夺取吐蕃政权,779年立佛教为“国教”。因此在藏文史书及宗教源流中被誉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同时,激化了社会矛盾、宗教矛盾,吐蕃王朝开始衰亡。赤松德赞的名号在汉文史书中有“乞梨悉笼纳赞、乞黎苏笼猎赞、乞黎苏笼腊赞、娑悉笼腊赞、娑悉笼猎赞、乞立赞”等。乍看起来与藏文实际名号有较大的差距且无法解读,但是一旦掌握了其规律,疑惑立刻就会破解。实际上“乞梨悉笼纳赞、乞黎苏笼猎赞、乞黎苏笼腊赞、娑悉笼腊赞、娑悉笼猎赞、乞立赞”这些都来自藏文的“赤松德赞”。其中“乞梨、乞黎、娑、乞立”是藏文“赤”的音译,“悉笼、苏笼”是藏文对音“松”。“纳、猎、腊”对音“德”。“乞立赞”像是藏文(khri btsn, khri lde btsn)的音译,但汉文史籍就指赤松德赞。《资治通鉴》记:“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贞元十三年(丁丑,公元七九七年)……吐蕃赞普乞立赞卒,子足之煎立。”^[11]在《旧唐书·吐蕃下》中也记载“其赞普乞立赞曰:……”等

6、牟尼赞普(mu ne btsn po)。根据史书《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与蔡邦妃共有四子,分别为:长子牟尼赞普早夭无坟,次子牟尼赞普,三子牟尼如赞普,幼子墀德松赞。797年父王赤松德赞薨逝,牟尼赞普当然地登上赞普王位。牟尼赞普执政一年零九个月,成为吐蕃在位最短的一位赞普。公元798年牟尼赞普被毒死后,吐蕃赞普位悬虚,陷入混乱状态。因牟尼赞普只有一年多短暂的执政历史,故在他的名号中没有出现“墀”,也就是说与汉文中的“赤、墀、器、弃、可黎、乞黎、乞梨、乞隶、乞立”无缘。因此,他的名号在汉文史书中除了“牟尼赞普”之外,《新唐书·吐蕃下》中出现了“足之煎”,这肯定是藏文“牟尼赞”的音译。

7、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n)。在父王与兄长

相继猝死,吐蕃政权混乱之际,佛僧娘·定埃增平息叛乱,拥立赤德松赞继为赞普。赞普为了感激和表彰娘·定埃增拥立之功,先后两次特立谐拉康石碑记其功勋。由此可见,吐蕃政权得到佛教势力的大力支持而得以继续。赤德松赞在佛教势力的支持拥立下继任吐蕃赞普,于是重申父王赤松德赞的崇佛政策,将佛教僧人引入吐蕃政治核心,担任宰相同平章事,更新相制,令钵阐布(ban de 或 dpl chen po)担任“僧相”,排位在众臣之上。应该说此举开了佛教僧人参与吐蕃政权的先河,奠定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基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截至公元863年,以后的历史佚失。但是在其他藏文史书中可以找到赤德松赞的不同名号,而汉文史籍中多见“赤德松赞”。藏史中有“赛那勒”,有莲花生赐名:mu tig btsn po。而《青史》等中记载“ju tse btsn po rgyal sar bskos”。在牟尼赞普与赤德松赞之间出现的ju tse btsn po可能是汉语“珠子赞普”(mu tig btsn po)的音译,就是指赤德松赞之兄。

8、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n)。在其祖父与父王大力宏佛的气氛中继位,藏史中称为持金刚的化身。赞普过度弘扬佛法使王室权力完全掌握在佛教势力手中,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吐蕃王朝的衰亡。此赞普的名号在汉文史书中有“赤祖德赞、热巴巾、可黎可足、彝泰赞普”。《新唐书·吐蕃下》中的“可黎可足立为赞普”可以依据当时的藏文发音,是藏语khri gtsug的音译。语言学家通过研究,这种远古发音特征在现在的安多话和拉达克语中可以得到证实,也就是“拆读法”,迅速发出所有音节。“khri gtsug”可读kha ri ga tsug。所以在汉文中必然出现“可黎可足”。《青史》中的“kha li kha chu”肯定是汉文史料中可黎可足的音译。“彝泰赞普”的由来,我们可以在唐蕃会盟碑上找到答案。东面碑文58行“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12]65行开始“大蕃彝泰九年,大唐长庆三年,阴水兔仲春十四日,写碑文。”^[13]在《新唐书·吐蕃下》中年代记为彝泰七年,与碑文年代相符。“彝泰”原意是“幸福永驻”,是唯一的吐蕃赞普年号,是由赤祖德赞所创,年号的采用源自中原。我们算出公元815年系吐蕃彝泰赞普元年,彝泰七年是公元821年,彝泰九年是公元823年。因此公元823年是唐蕃会盟碑立碑的确切时间。“彝泰”无可非议是藏文skyid rtg的音译。

9、朗达玛(glng dar ma)。根据藏文名号在汉文中出现了“达磨、乌都赞、朗达玛”。《资治通鉴》载:“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14]在《新唐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达磨”是朗达玛早期比较常用的名号。“达磨”是梵文,在藏文中是“佛教”之意。可以看出对赞普同样寄予了继续弘扬佛法的期望,而后期的史书中多见贬义的“朗达玛”。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九位赞普名号的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古代汉文史籍与金石铭刻、敦煌文书、藏文古籍一样,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古代历史、远古宗教、民族关系等不可缺少和非常珍贵的史料。而掌握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历代赞普名号的由来,同样是不容忽视和需要认真研究。(二)通过对赞普名号的解析和考证,能够窥见藏族古代文明的发展以及语言特征和翻译技巧的基本发展轨迹。(三)通过研究赞普名号的变化,同样可以了解和展现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四)本论文的完成,相信给从事藏史教学和研究者提供便利和启示,从而更进一步地发现和解决藏族历史中的疑难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拉萨:民族出版社,1992:212.
- [2] 为了便于排版,藏文只好使用拉丁文撰写藏文
- [3] 藏族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12.
- [4] 平措次仁.藏史明镜(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16.
- [5] 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M].诺章·吴坚,平措次仁,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19.
- [6][7]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9,145.
- [8][10]《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上”记载。
- [9] 巴俄·祖拉称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293.
- [11]《资治通鉴》卷二三五,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网络发展部制作。
- [12][13] 王尧,陈践.吐蕃文献选读[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美国)[M].李方桂,柯蔚南,王启龙,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 [14]《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网络发展部制作。

On the Tsanpo's Title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Wangduo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Just like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is the precious history literature to stud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cient Tibetan history, the ancient relig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Tibet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precisely study Tubo Tsanpos' titles and their origin. By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y study,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the paper verifies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ubo Tsanpos' title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v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phenomena of the period.

Keywords: Chinese and Tibetan history literature; Tubo Tsanpos; titles

[责任编辑:肖干田]